

马克思的技术分析方法及其当代价值

练新颜,夏诗婷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宁 530004)

摘要: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这些分析却缺少技术分析的维度。技术分析是马克思理解社会变革的关键钥匙,是评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回到马克思的技术分析方法,通过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来理解技术本身的变化,这样才能理解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

关键词:技术分析;后工业社会;技术变革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062(2020)03-0082-05

战后的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用很多新词来描述: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社会、后福利社会、后传统社会、后工业社会等等。这些理论都从某一方面来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都是非常准确而精辟的。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几乎都是从“上层建筑”来理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而从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力中最核心、最活跃的因素——技术的变化来理解当今资本主义变化的研究却很少。虽然后工业社会的研究相对于其他研究而言较多谈论“技术”,但却是在抽象层面谈论“技术”,甚至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现象而一笔带过,理论重点仍然在文化、社会结构、权利分配、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研究。一些理论家认为,在后工业社会里,阶级发生了大扭转,工人阶级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白领阶层;马克思所论证的剥削已过时……当然与之相反的理论也非常盛行。这些左派或者是右派的观点都各自为阵,为了自己的目的和立场辩护,每一派的理论家都提出了看起来很充分的理由。正是因为缺少技术分析的基础性研究,后工业理论等一些研究众说纷纭,最后不了了之,“后工业社会”一词成了无所不包的新名词。这里说的“技术”是在贝尔的定义上来说,仅仅指物理技术,也即对“实物的管理”;而不包含当今非常流行的管理方面的“社会技术”,也即对“人的管理”。贝尔区分了“技术知识分子”的两种

类型:使用知识的技术人员和从事行使权力的技术官员。“技术知识——对事物的管理——是许多决策(包括政治的和战略的决策)的一种必要和发展着的组成部分。但是权力——人与人之间的综合,不能总是用技术方式来下命令。当权的技术官员,不管他使用多少技术知识,仍然只是政客的一种,而不是技术人员。”^[1]

一 技术分析是 马克思理解社会变革的钥匙

技术在马克思庞大的思想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位置。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对马克思思想的“主导线索”做了精辟的概况:生产关系的总和,即人类组织社会生产及其使用工具的方式,构成了社会的真正基础;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并形成了与此基础相适应的一定的意识形态^[2]。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也指出,技术变迁处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核心,人们无论是在企业家积累的内在驱动中还是在国家或顽抗的工人造成的外在压力中发现了其源泉,这都是一个具有某种意义的问题^{[3]12}。

但是遗憾的是,对马克思的研究常常不关注技术分析作为分析社会的基础,不注重“企业家积累的内在驱动”而注重“顽抗的工人造成的外在压

【收稿日期】 2019-12-16

【作者简介】 练新颜(1976-),女,广西容县人,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食物哲学。

力”。在马克思的体系里,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核心体现在“生产工具”的变革上。马克思把技术分析作为主线来理解生产力要素在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关系的背景下去理解和构建其思想体系。技术分析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里的基础性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技术分析是分析人类活动的基础。马克思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从人的实践活动首先是生产活动来理解人:“(人)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现在和几千年前都一样。”^[4]在需要为生活必需品劳作方面,“现在和几千年前都一样”,但是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从批量生产到智能化生产,人类的劳动工具和劳动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工业4.0”的时代,这些技术的变化对工人、对工厂、对市场的影响如何?这些技术设计怎样导致“消费社会”“审美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形成?在“工具-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社会变革链条中,各个环节都被单独地仔细分析过,但是他们之间的关联和过度却没有被系统分析过。

其次,技术分析是我们理解自身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步骤。马克思有句名言: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来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马克思把技术分析和技术史作为人的本质来理解,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理论视野的开阔:技术不仅仅是工具性的有用的存在,更是人类社会关系形成、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和度量尺度。这里,马克思的技术分析也给了我们一个方法论上的指导:技术分析应该和技术史的分析结合在一起。

最后,技术分析是分析社会变革的根本。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4周年时发表的演讲中形象地比喻:蒸汽机、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5]。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信息技术发展,互联网是否成为“危险万分的革命家”?贝尔认为信息革命带动了社会的根本性变化,因为“信息革命产生的是技术专家为首的社会”,他判断“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了“知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不再是统治阶级。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

出现的”^[6]。所以,要判断当今资本主义是否发生了“革命”,我们首先要研究:新的信息技术是否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力结构和发展程度?如果说这些技术是“新的生产力”,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关系和“一切社会关系”?技术革命导致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是否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要系统地研究这些问题,通过微观层面的实证技术分析才能更好地找到答案。

二 技术分析为何缺位

为什么很少有后工业理论家把技术分析摆在重要的位置呢?究其原因有两点:

一是,技术被认为仅仅是工具。工具作为手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本身。但是技术,正如被许多学者证明了的一样,技术是被镶嵌在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它们背后都有不同的理念和信仰在支撑着它们的作用,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工具。埃尔斯特解读马克思的技术观时说“技术对社会变革的意义时是很独特的,人们不难理解制造工具何以对人性的发展的特别是对时代的意识如此之重要。工具的制造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因为它在制造的时候为了日后更多的消费明显地包括了先前的某些消费。……而且,使用制造的工具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因为死劳动和活劳动的联合作用。用工具制造工具——最终达到用机器生产机器——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结合到了一个综合的运动之中。”^{[3]61}正如马克思所说:“……因此,他们(人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一致,又和他们这样生产一致。”^{[7]24}

如今,技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背景。马克思曾经强调“历史的每一阶段都会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7]43}也就是说,技术对人类的影响是持久的,相互作用的,技术是可以和文化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我们的行动和思维方式。由此,马丁内斯(Cecilia R. Martinez)甚至认为,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恢复是技术力量推动的结果,而不是社会愿望的反映^[8]。

二是,在现代制度框架研究中,技术通常不被看作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仅仅被看作外在于制度本身的工具。例如菲利普·布瑞(Philip Brey)认为在马克思理论中,技术仅仅是作为经济结构的外部条件,而经济结构则最终决定了社会的形式^[9]。早期的后工业理论先锋丹尼尔·贝尔尽管在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充分肯定了技术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提出了知识技术的“中轴原理”,但他却强调技术并不是所有其他社会变迁的首要决定因素,他仍认为技术作为经济的范畴和其他政治、文化是“不同的逻辑”^[10]。贝尔这种把技术从其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中割裂的观点影响深远。莎拉·M.福特(Sarah Michele Ford)认为正如工业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个经济范畴一样,后工业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经济范畴;网络技术的出现只是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现象和表现^[11]。技术与政治、文化是截然不同的领域吗?被认为是当今资本主义主导技术之一的信息技术仅仅是一个表象吗?事实上,正如许多学者已经证明的那样,技术与政治(温纳)、技术与城市化(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社会结构(丹尼尔·贝尔)、技术与文化(米切姆)、技术与消费(让·鲍德里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芒福德甚至认为现代审美的倾向是由机器塑造的^[12]。马克思其实对此有充分的论述。他在《工厂视察员报告》中指出“近年来,任何一种机械发明都不像珍妮纺纱机和精梳纺纱机的创造,在生产方式上,并且归根到底,在工人的生活方式上,引起那样大的改变。……这里,正确地表达了实际的联系——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13]501}这种“密切的联系”不是决定论式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交互作用,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把这种关系称之为“社会建构论”:技术在社会建构中形成,而技术本身也参与了社会的建构。

当我们探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新变化时,如果忽视了至关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分析,只能是隔靴搔痒,陷入眼花缭乱的现象中而不知道其中变化的原因和趋势。

三 不应把马克思的“技术”狭隘化

对马克思的“技术”的理解存在着三种狭隘化的论点:一种是认为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这种理论认为马克思过于重视技术、生产工具等“有

形”的物质基础,而忽视了文化、宗教、甚至是习俗等“无形”的社会力量。认为马克思是决定论者的观点是把马克思所理解的“技术”的狭隘化。事实上,马克思强调的是“生产工具的使用方式”,这就涉及社会的组织形式、管理体制、权力分配甚至生活节奏、行为方式的安排。马克思所理解的“技术”也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关系,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用机器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项政治安排。那种认为技术仅仅是改造自然的能力,即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涉及社会关系的观念不只是陈旧的还是狭隘的。

第二种是,把马克思所说的“技术”狭隘理解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我们常常把物质生产工具作为人类社会变迁的划分标志:石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等;在技术史上我们也偏重于物质生产技术,而一些非物质生产的工具尽管对人类社会非常重要却被忽视了。事实上,马克思尽管很强调“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标志”,但是他并没有忽视其他非生产技术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这方面的最著名的论述是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杠杆。”^{[13]427}马克思列举的这三项技术都不是物质生产技术:火药属于军事技术,不是生产的而是破坏的技术;指南针属于航海技术,可以算作交通技术的范畴;印刷术属于文化技术。而到了后工业时代,技术的发展更多地集中在信息技术和娱乐技术(如影视、音乐、社交网站等)而不是有形的物质生产技术。一些学者固守着只有物质生产技术,也就是传统的工业、制造业才是改变人类历史的技术的观点,而对信息技术这些新兴的非物质生产技术采取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认为它们只是传统生产技术的点缀或者辅助工具而已,并不能成为“新的产业”。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斯蒂芬·S.科恩(Stephen S. Cohen)和约翰·齐思曼(John Zysman)认为,所谓的后工业是个神话,如果美国接受了这种转变,那么整个美国经济将受到不良影响。泰勒·考恩(Tyler Cowen)也认为所谓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对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更无法像20世纪初的汽车、火车、电力等发明那样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如果对新技术没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就不能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继托勒夫之后,凯文·凯利(Kevin Kelly)成为新世纪的技术未来学家。他在《必然》《新经济新规则》《技术元素》等系列著作中表达了一种非常乐观的技术理想,他相信廉价、强大、可靠、无处不在的芯片能拥有“改变一切”的力量,我们能通过技术本身的“温柔进步”而不断完善社会自身。凯利认为后工业社会将会在网络世界里实现“数字化社会主义”^[14]。凯利在一定程度上对技术的发展和本质要求有深刻的洞察力,但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成为“数字社会主义”,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第三种论点是非常重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技术的评判作用,但忽视了技术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芬伯格说“马克思对他那个时期的市场和工厂系统进行了革命性的批判。”^[15]也就是说马克思对技术的分析是在微观层面的,而且是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但我们对新技术的分析却缺乏这样的微观实证基础。例如凯利提出了网络新经济不同于传统经济的十大原则^[16],这些原则在凯利看来足以颠覆原有的经济模式。但是他却没有深入互联网公司去了解新技术的具体运行,以及从业人员是如何工作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新技术十分了解基础上,对“市场和工厂”考察的基础上,再进行“革命性的批评”,从而才能更准确地、批判性地看待当今资本主义。

四 回到马克思的技术分析

鲍里斯·弗兰克尔(Boris Frankel)说,对于一位社会主义者,对于“后工业”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外有两种选择:一是将这些新发展新变革极力解释为相对表面的变化,无法动摇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关系;二是试图去解释和预测这些新发展新变革将会怎么影响资本主义社会^[17]。采取第一种立场,对新技术带来的新发展新变革视而不见是不理智的;采取第二种立场,动态地而不是刻板地理解马克思的技术分析立场,在微观层面对新技术进行实证分析,才能进一步完善和丰富马克思关于技术和生产力的理论。

如今,贝尔、托夫勒、琼斯、弗兰克尔等一批后工业社会理论家发表他们的著作已经过去了20多年。在这20多年里,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并蓬勃发展,原有的技术如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有的技术的发展甚至远离初衷。虽然新一代

的理论家也同样认为技术具有基础性地位。如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在《帝国》等著作中指出,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整个社会、文化甚至审美和人的性格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基础就是技术的革新。英国哲学家罗斯·阿比奈特(Ross Abbinnett)称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为“技术资本主义”^[18]。遗憾的是,对于技术本身的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即技术导致的市场、工作场所的变化以及为什么技术将导致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却没有详细论述过。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新技术的本质,与市场、企业如何相互作用,那么在实践中就会过于乐观或者悲观:乐观主义草率地认为只要简单地运用新技术就能改变现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和不平等;悲观主义则仅仅把技术作为一种工具,过分贬低了技术的价值和社会变革的力量,看不到现实中新的技术对资本主义原有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改变。

在微观层面的实证基础上进行技术分析,从技术发展和其本身的要求来理解后工业社会的特征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通过最新技术发展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可以观察到和经验到的种种正在进行的实际趋势和变化的考察,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仔细分析这些新技术和新变化的特征和本质,并在技术史上,对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以来的技术和后工业社会理论与当前的新技术和理论进行对比考察,才能进一步加深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如果我们不能在新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等新一代技术的背景下重新认识马克思关于技术本质和技术的社会作用的诠释,重新回到马克思对技术分析的实证传统,我们就不能充分地纠正后工业社会的种种迷乱的现象。技术分析对于后工业社会技术现象和文化现象,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对我们如何借鉴利用这些新技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至关重要。

【参 考 文 献】

- [1]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M].高铨,王宏周,魏章玲,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85.
- [2] 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3版.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
- [3] 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M].何怀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3.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3.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M]. 中文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 [8] MARTINEZ C R. Energy, technics and post - industrial society: the politic economy of inequality [D].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1990: 11.
- [9] BREY P. Theorizing 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M]. London: The MIT Press, 2003: 5.
- [10] 贝尔.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M]. 严蓓雯,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322.
- [11] FORD S M. Are we to be forever trapped between the two? [J]. Social thought & research, 2002, 25 (1/2): 85 - 110.
- [12] 练新颜. 论机器对审美的塑造: 从刘易斯·芒福德的观点看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4(1): 35 - 40.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7 卷 [M]. 中文 1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 [14] 凯利. 必然 [M]. 周峰, 董理, 金阳, 译.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154 - 155.
- [15] FEENBERG A. Modernity theory and technology studies: reflections on bridging the gap [M]. London: The MIT Press, 2003: 81 - 83.
- [16] 凯利. 新经济, 新规则: 网络竞技的十种策略 [M]. 刘仲涛, 康欣叶, 侯煜, 译.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
- [17] 弗兰克尔. 后工业乌托邦 [M]. 李元来,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5
- [18] 阿比奈特. 现代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政治、技术与社会变革 [M]. 王维先, 马强, 嵇明亮,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Marx's Technical Analysis Method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LIAN Xin - yan, XIA Shi - ting

(College of marxism,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A series of important changes took place in post - war capitalist countries, which have been deeply analyz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but these analyses lost the technical dimension. Technical analysis is the key to Marx's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change and the precondition for him judging the capitalist society. Only by returning to Marx's technological analysis method, and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 of technology itself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at the micro level can we understand the current capitalist society and its ideology.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analysis; post - industrial society; technological change

(责任编辑 魏屹东)